

明清初，岭南寺僧在佛事之余，潜心诗文书画，以海幢寺等处为主要活动场所，或赋诗讲学，或与文士雅集，名噪一时，历经数代传承而风雅不减，成为我国艺术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幢寺作为清代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同时也是清代第一座对外国人开放的寺院，在中外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座融宗教文化、海丝文化与书画艺术于一体的岭南名刹。

为向国内外观众呈现岭南的文化艺术和独特历史，让广大观众更好地了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影响，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局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海幢寺承办，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协办的“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3展厅正式向公众展出。

展览分为“禅林翰墨”“海幢古韵”“交流共融”三个单元，精选岭南寺僧书画的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作品，系统梳理其艺术发展脉络和艺术风格，展现岭南寺僧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又以器物造像、历史照片、经坊刻本等立体展示海幢寺的历史沿革、园林建筑与盆景艺术，以及诗教、经籍刻印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同时，精选外销画、外文图书文献等展品，以彰显海幢寺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与突出贡献。

此次展览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展览以岭南寺僧书画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作品与海幢寺的历史文化艺术两条线索展开，较全面展现岭南寺僧的书画创作。二是展览全方位展示海幢寺的历史文化艺术。海幢寺作为清代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后又因机缘成为清代第一座对外国人开放的寺院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梵刹之一，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展览透过海幢寺呈现岭南地区从清代中晚期开始的对外文化交流情况，为考察中国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个案和切入点。

禅林翰墨

僧人书画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岭南寺僧的书画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至清末清初成就最为突出，以德清、函岳、成鸞、道恣、今释、今无、大汕等为代表的岭南僧人，汇聚了不同书学根基的遗民、僧众，形成了一个以个性纷呈为主，兼具“山林体”共性色彩的僧人书画群体，极大地振奋了广东书坛。一代代岭南僧人的书画创作，对于丰富岭南书画艺术表现题材与内容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岭南书画艺术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可谓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文化遗产。

行书五言诗轴 明末清初 释函岳 纵136厘米、横67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图1) 函岳(1608—1685)，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本姓曾，俗名起莘，字宅师。原籍广东南雄，后迁番禺。明崇祯六年(1633)举人，后感于时局动荡，无意仕途，崇祯十三年(1640)至庐山拜空隐道禅师为师，削发为僧，法名函岳，为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明清之际，他历主海云、海幢、丹霞别传诸寺，可谓当时广东佛门中的领袖人物。天然和尚道声远扬，父母姐妹妻子在其影响下成为僧尼，皈依其座下的“今”“古”“两庵”以及遗民、剃度者和居士百余人。他不仅精通禅理，而且善诗文，著述颇丰，有《唐堂诗集》《天然和尚梅花诗》《天然禅师语录》等传世。

行书诗轴 清顺治十一年(1654) 释今无 纵130厘米、横46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2) 释今无(1633—1681)，俗姓万，广东番禺人。16岁即师从天然和尚为僧，法名今无，字阿字，为天然和尚第一法嗣、曹洞宗三十五代传人。22岁时受天然和尚指授，徒步万里探望被清廷流放辽阳的师叔释函可。康熙元年(1662)任海幢寺住持，苦心经营，借助平南王尚可喜及一众地方官员之力，大举扩建殿、阁、楼、塔、堂、舍等。他在诗、书、法方面颇有建树，著有《光宣合集》《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四分律藏大全》等。

行书《法性善提树诗》明 释德清 纵196厘米、横74厘米 广东省博物馆藏(图3) 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法号德清，自号憨山。安徽全椒人。其精通佛、道、儒三家学说，在佛教内主张禅净双修，对外又宣传佛、道、释三教调和，有《观楞伽经记》《华严经纲要》等行世。在明末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与紫柏真可等并称为明末“四大高僧”。此外，他擅长诗文书法，来往南北，多为人撰写碑记塔铭，所作序跋题赞亦不少。与海幢寺空隐道和尚等法缘甚深，《圆觉经直解》《楞伽笔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说》《大学纲目决疑》《中庸直指》等著作由海

岭南文脉的千年传承

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展 何薇

禅寺经坊刊刻流通。**竹筒字拓本轴 1934年 释函岳 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藏(图4)** 此拓原竹筒藏于海云寺，为释函岳在1664年浴佛节铭刻并交付今释摩之传法信物。今摩(1629—1698)，字衍衍，本姓曾，名琮，释函岳之子，从函岳落发于雷峰海云寺，法名今摩。此为函岳小楷书，在其书法中较为罕见。

海幢古韵

海幢寺位于今广州市海珠区。五代南汉时期，其址曾有千秋寺，后废为民居。明末，僧人池月、光半又在此建海幢寺。据《广东通志》记载：“海幢寺在河南，盖万松岭福场园地也。旧有千秋寺，南汉所建，废为民居，僧光半募于郭龙岳，稍加葺治，颜曰‘海幢’”。清康熙年间，海幢寺大举扩建，先后建成大雄宝殿、天王殿、山门等建筑23座。自此，海幢寺成为岭南雄刹，并与光孝寺、华林寺、长寿寺、大佛寺齐名，成为广州五大丛林之一。四百年以来，海幢寺不仅以其独特的历史、宏伟的建筑、引人入胜的园林景致、别具一格的“素仁格”盆景艺术等为人所称道，更以其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底蕴，以及自天然和尚以来形成的诗文书画艺术传承闻名于世。海幢寺既是岭南地区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当时诗僧文士的重要雅集之地，可谓是清代以来广州乃至中国佛教寺院发展与传播的一个独特案例。

海幢寺钟板堂铜钟 清康熙十五年(1676) 高91.5厘米、最大直径51.5厘米 广州市海幢寺藏(图6) 钟体呈直筒状，弧肩、平口。钟钮为圆雕双龙形，龙首面部狰狞，龙嘴紧贴钟顶，四肢直立，龙身拱起，背部顶端有火珠，雕刻精细，造型生动。肩部一周莲瓣纹，钟体被凸弦纹分成了四格，格内铸铭文。四个撞座为八瓣莲花状，位于钟体下部。近口沿处饰一周回文，钟口外侈，饰莲瓣纹。

交流共融

清乾隆二十二年(1857)，清政府加强了海禁，实行“一日通商”，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海关，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十三行”被清政府指定为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活动场所。海幢寺与“十三行”临江而立，隔水相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园林景致，逐渐成为两广总督的外事接待场所以及官方指定的外商游玩之地，也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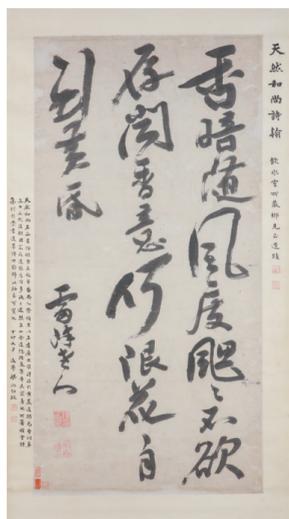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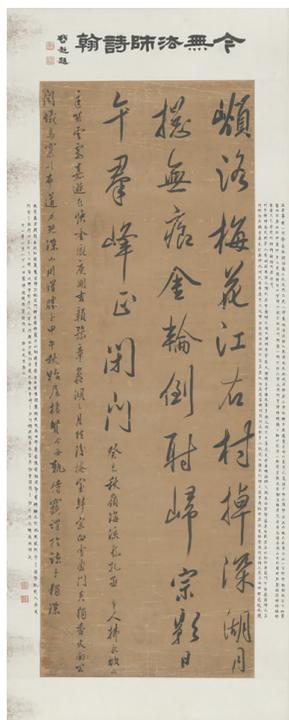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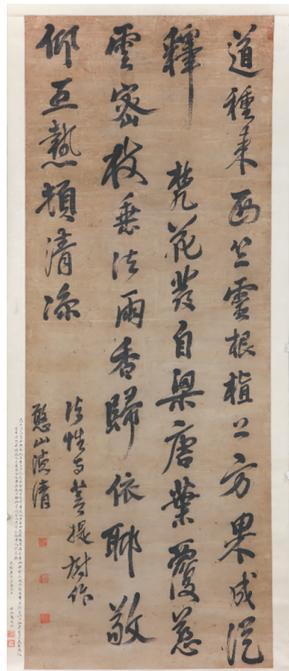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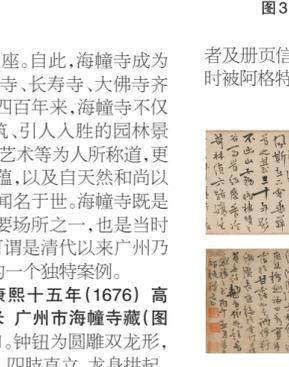


图4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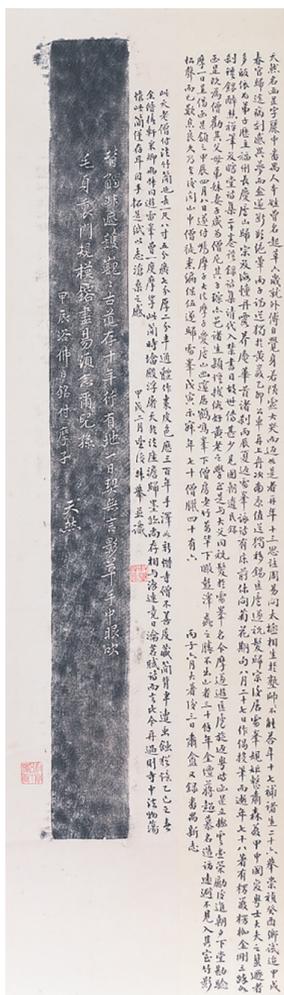


图4



图6

成为清代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寺院。期间，海幢寺接待了多个重要使团和大量游客，遂成为西方人眼中广州乃至中国最重要的寺院之一，经常出现在西方的报刊、游记以及外销画中，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名度。此外，因刻印的许多佛教经典都被越南僧人引进重刊，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在越南的传播，海幢寺在东南亚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 清嘉庆元年(1796) 纵41.3厘米、横50.2厘米 广州市海幢寺藏(图7) 该册页为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首席代表曼纽尔·阿格特(卒于1803年)(Manuel de Agote)于1796年定制。该画册共48开，其中44开为水彩画，每一页均以图解形式用水彩及描金详细描绘十八世纪之海幢寺中各庙宇近景及庙宇内所供奉神像。扉页以西班牙文及中文记录其所有者及册页信息，并附折页式海幢寺全景地图。画册当时被阿格特带回欧洲之后即引起轰动。



图5



图7

从江西省博物馆藏明器看汉代「孝道」观念

邢琳

子曰：“爰爱自己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

这段文字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祭义》，强调了孝道的重要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一直被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孝道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在汉代，孝道观念尤为盛行，是最基本的社会、宗教概念，汉代崇尚儒学，以孝治天下，汉高祖“重孝”、汉惠帝表彰“孝”等都是汉代崇尚孝道的集中体现。汉代统治者对儒家经典《孝经》尤为推崇，强调“孝”是“德之本”。《汉书·景十三王传》就记载：“广川惠王越……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这说明当时人们普遍重视孝道，并将其作为个人品德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时期，“举孝廉”“推恩令”等政策手段的推行和实施，进一步推动两汉“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和思想理念，使得孝道观念在汉代社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孝道也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标准，被广泛推广和提倡，深入到家庭伦理和亲情、个人品德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如《后汉书·荀爽列传》：“兄弟孝养，阖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讲述了陈纪、陈谌兄弟的孝养故事。孝道观念不仅体现在父母长辈在世时“奉养”行为中，也影响到汉人的丧葬观念，譬如厚葬行为，也可以认为是尽孝道的一种延续。《礼记·祭义》提及“事死者如事生”，“事死”如“事生”可以认为是孝道的最高境界。纵观已经发掘的汉代墓葬，可以发现汉墓中处处可见与“孝”相关的内容，随葬器物上常有与孝道相关的铭文，又如汉代画像石上也常见孝行图，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中就有关老莱子扮作婴儿之态敬奉双亲、韩伯瑜感念母亲年迈等表现孝子孝行的故事。

江西已发掘汉墓随葬的实用器具和模型明器也搭配周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10期)，出土器物有铜器釜、甑、锅、豆、陶器的鼎、奩、熏炉、壶、仓、灶、井等；江西南昌市南郊汉六朝墓(《考古》1966年03期)，汉代墓葬中出土瓮、罐、虎子、仓、井、灶、案等；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槨墓(《考古》1965年06期)，出土铜器有剑、镜、钁、壶、勺、熏炉、锤、鎗，陶器有鼎、盒、壶、罍、瓮、罐、洗、陶屋模型，此外还有玉器、漆器等。其他墓葬的随葬器物情况不一赘述，大致总结江西汉墓所涉及的随葬器物既有具备实用价值的鼎、盒、勺、镜等，也有大量陶屋、陶厕所等建筑模型以及以仓、灶、井为主要组合的模型明器，这些“微型”模型明器组合在一起，为逝者搭建了一个完备的生活空间，祈求人的灵魂有一居住场所，是现实世界生活起居的缩影，可以认为是“事死如事生”的直观体现。

关于仓、灶、井、案、厕所等模型明器组合，在各地汉墓中常有发现，山东、河南、湖北、内蒙古等多座墓葬中均能见到类似的器物组合模式。首先谈一下陶仓，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汉书·食货志》提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与货共为“生民之本”，盛放粮谷的仓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涉及粮食的储存和保护，它的数量和质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财富价值的衡量和体现。江西汉墓出土的陶仓多以三足圆形为主，譬如1960年南昌市双港汉墓出土的绿釉陶仓(图1)，就是三足、圆形、敞口的造型，仓正面开一方形小门，盖呈斗笠状，上边竖立一鸟，器盖、器腹均饰密集，1960年南昌青云谱汉墓出土陶仓形制亦与之相似。明器谷仓在汉代所蕴含的意义以及仓盖飞鸟的性质，可以参考扬州祁江出土的东汉早期绿釉陶仓，仓房上刻有两竖排铭文：“屯壘大吉利内谷”“屯上鸟凤凰皇富贵贵央”，故随葬模型谷仓或可视为人死灵魂归于天地之后，衣食丰厚、储藏粮食之用。

汉墓中随葬的大量与饮食有关的模型明器，还有陶灶。《汉书·酈陆未刘叔孙列传》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古人将粮食视为生活的首要关注点，而灶是生活中的重要器物之一，通过灶来烹饪食物，是实现饮食需求的基本保障。根据《白虎通义·五祀》记载，灶为“户、户、井、中霤并称为汉代‘五祀’，灶尚承载着汉代人祭祀的精神内涵。1960年南昌双港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灶(图2)，由灶身、釜、甑、甑、锅构成，灶身呈船形，灶的前端有一个半圆形的风火门，灶上有三个火眼，分别置锅、甑(釜与甑)罐，比现实生活中的灶少了烟囱等，江西汉墓出土陶灶及少量铜灶形制均属此类。在墓葬中随葬陶灶的习俗，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古人希望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祭祀”体现对死者生前生活的尊重和缅怀。

水是农业发展和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汉代的井渠灌溉已经非常先进，譬如井渠法、龙首渠等，而“井”的开凿和利用，对于保障生产生活、扩大活动范围非常重要。井也是“五祀”之一，根据《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井也常与灵异、死亡等社会事件相结合，或具有象征死亡、预示生命的意义。1960年南昌双港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井，似乎是汉水井的真实写照，井口竖立一梯形井架梁，架的横梁上安装着一活动的滑轮，滑轮下方吊着一只汲水罐。江西汉墓出土陶井，基本都是“井+汲水罐”这种组合模式，如1960年南昌青云谱东汉墓出土陶井(图3)，即口小底大的水井配一小罐，唯不见吊汲水罐的横梁，这种区别或许与汲水方式的差异有关。

除仓、灶、井等，江西汉墓也常随葬厕所类模型明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厕所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之一。“厕”事(便溺)与前文提到的粮、食、水密切相关，战国安吉五福楚墓的出土文物表明，战国时期贵族已使用漆木质的坐便架。根据各地汉墓出土的明器厕所，可以断定汉代已有较为成熟的旱厕，部分厕所所有男女之分，而黄河流域更是出现了“厕所+猪圈”模式的阁楼式厕所。1956年南昌市东郊汉墓出土陶厕所模型(图4)，厕所呈长方形人字顶吊脚平房，两开间，每间开一方形门，内部分别设一个长方形蹲坑，坑两侧还置有脚踏，可见汉代江西的厕所设施已相对完备。这些厕所模型明器的出现，表明在汉代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厕所这一生活设施，并将其作为墓葬中随葬品的一部分，这或许也反映了古人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死者生前生活的尊重。

古人对于父母、先人的尊重和孝敬，并不因为他们的离世而结束，这从汉代墓葬的厚葬之风以及许多墓葬中随葬的仓、灶、井、厕所等明器中可以体现。墓葬这一空间加之诸多随葬器物构成了完整的生活场景，也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阴阳观念。仓、灶、井、厕所等建筑贯穿古人现实生活的住、食、便溺等生活和生理需求，这些微型化随葬明器反映了古人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细节的追求，也传达了他们希望先人死后依然能够像生前一样衣食富足、生活无忧的美好愿景，是汉代“孝道”盛行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孝道”这一传统观念，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对当代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通过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孝道”的观念内涵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能够更充分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有效促进道德建设，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本文系2023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江西汉墓反映的汉代生死观”(23w11)阶段性研究成果】



图1 东汉绿釉陶仓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2 东汉绿釉陶灶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3 东汉水波纹堆塑绳纹陶井 江西省博物馆藏



图4 东汉屋形陶厕所 江西省博物馆藏